**对“我邦”的强调**

尽管我们可以看到《日本诗史》中自觉的文献批判意识，但若细读文本对历史材料的运用，则能发现在这种意识背后的，对“我邦”的强调。

整部《日本诗史》，是经由“阿直岐、王仁来日献书”这一事件展开的。一般汉文学史，乃至汉学史的研究，都十分强调这两位渡来人在汉学传入日本时所起到的作用：首先，《周易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等，构成了日本最早接触到的汉文经典，标志汉字开始系统传入日本；其次，自继体天皇开始，百济会定期献上五经博士，汉文化于是有了稳定的输入来源；此外，渡来人自此以后长期在朝廷担任史官或博士，成为日本的一个重要氏族。

那么，《日本诗史》是如何展开这一事件的呢？对阿直岐和王仁两位博士来日的时间，江村北海的记述和一般史书记载并无出入。而值得注意的是，《日本诗史》提到王仁在仁德天皇即位迁都之时，献上了所谓的《梅花颂》。江村北海认为这是“三十一言和歌”。

但同时，《日本诗史》亦记载了对于这段史料的质疑：王仁是外邦人，怎么可能会作和歌？“距今千有四百年，载籍罕传，其详不可寻而知也。”可见江村北海自己也认为这段史料过于久远，可信度不那么高。

然而，他仍旧采纳了这短短数语，并针对上面的质疑给出了自己的回应。他认为有两种可能：一、可能是当时的史臣翻译了王仁的意思，写成了和歌；二、王仁归化已久，已经熟悉了日本的语言，向别人学习，而后作了和歌。

这种做法和《日本诗史》正文中所体现的文献批判意识似乎有所出入。一方面，北海自己也不确定史料的来源是否可靠；另一方面，他将这模糊的史料放在了卷首——“献和歌”作为一个象征性的事件，被归在了王仁的名下。

这种意识上的内在矛盾意味着什么？

从《日本诗史》引征的史料来看，江村北海并没有说明这三十一言和歌是有史以来的第一首和歌。而其中所要传达的意义要从两方面来看。一方面，在《日本诗史》所载文献的序列中，这篇和歌出现在日本最早一批输入的儒家经典之后，同时位于大友皇子所作五言四句的汉诗之前，说明日本的和汉文学在诞生之初并未出现显著的差距。另外一方面，作为渡来人的王仁献和歌于天皇，象征了渡来群体的归化，而归化的前提是：接受归化的这个民族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文化自觉。

接着看江村北海对于这段史料的回应。

一、可能是当时的史臣翻译了王仁的意思，写成了和歌。这首先意味着当时的和歌已有较为固定的体式，包括文字的形态、发音以及和歌的形式都有了一定的规范。其次，按照这种说法，王仁并非《梅花颂》的原作者，但江村北海依旧肯定了王仁在其中的作用。这说明王仁的功能很重要。按照本编的说法，他不仅是推动汉文化在日本上层传播的重要人物，更是第一个将和歌带到天皇面前的人——这意味着开启了和歌进入贵族文化的可能。

二、王仁归化已久，已经熟悉了日本的语言，向别人学习，而后作了和歌。这种理解除了如之前所述，证明了和歌在当时具备一定体式以外，还说明，在《日本诗史》对汉学传来这一事件的构建中，并非汉学的单方面输入、影响日本，还有和文化的反向作用。在这里，王仁这一符号，同时具备了汉学传播和受容日本本土文化的功能。